

《八千里路云和月》：

战火与炊烟中的平民抗战叙事

○ 但敏



2026年5月20日 星期三 主编：周星
责编：倪尧 美编：庞红梅 校对：梅莹 金苗
文化艺术网/数字报 www.whysw.org

A04

文化艺术报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当岳飞的千古绝句化作一部全景式百姓抗战剧的标题，它所承载的便不只是颠沛流离的路途，而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坚守与抉择。热播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突破传统英雄叙事的桎梏，将个体命运置于宏大的历史场域中，在战火与炊烟的交织中，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折射时代的风云激荡，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觉醒图景，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在沉重的历史回顾中彰显中国人的民族气节与精神力量。

突破叙事窠臼： 人民史观下的双轨叙事

《八千里路云和月》突破单一线性叙事，采用“战火与炊烟”双线叙事法，为抗战题材注入了新的叙事活力。国民党少将张云魁与市井厨子孟万福经历命运流转与交织，前者在前线经历从旧军人到新信仰者的转变，后者在后方完成从苟且偷生到责任担当的觉醒。主线聚焦于前线战场，通过张云魁为洗刷冤屈而隐姓埋名、继续坚持抗日的故事，展现了国民政府内部的腐朽不堪，以及少数爱国官兵的英勇奋战。支线深入市井，伙夫孟万福照顾张云魁家人，在一次次逃亡与反抗中展现战乱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哲学。双线形成强烈的叙事张力，不仅突破了抗战题材传统的叙事结构，以微观视角展现宏大历史，也深化了“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主题内涵。这种从上层军官到底层百姓的人物设定，以人民史观重新诠释了抗战的主体——四万万普通人。

剧中使用了大量插叙，胆小的孟万福逃离战场，回到伙夫岗位，在炉灶台前回忆着硝烟弥漫的战场和浴血奋战的队友，不禁泪流满面。通过“记忆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穿插，形成虚实相生的叙事张力，表现出中国军人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同时，也为贪生的伙夫“孟万福”最终成为地下工作者埋下伏笔。

人物角色塑造： 乱世中的凡人英雄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历史，还在于通过个体命运的书写，实

现与当下观众的精神共鸣。剧中的人物没有确凿的历史原型，却凝聚着无数先辈的影子：张云魁的信仰转变，映射着那个年代知识分子与军人的觉醒之路；孟万福的成长担当，代表着底层百姓在乱世中的精神崛起；丁玉娇从养尊处优到投身革命，展现了女性在战争中的力量。

剧中人物跨越不同的阶级，在残酷的战争中凝聚成命运共同体：被当成弃子扣上“逃兵”帽子的张云魁，最终的觉醒不是顿悟，而是在屈辱与迷茫中的艰难跋涉。胆小怕事的厨子孟万福，为了实现承诺，尽心尽力照顾张云魁家人。饱读诗书、满腔正气的张云魁的父亲，深具爱国情怀的民族资本家田家泰，身处社会底层的韩小月……他们在压迫中觉醒，在绝境中抗争，这些具有人性弱点的普通人，共同组成了一幅中国社会抗战“全景图”，在至暗时刻涅槃重生，尽显民族气节。

剧中传递的“以平凡铸伟大”的精神，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正如该剧导演张永新所说，“民族觉醒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人在关键时刻的坚守”。当我们看到厨子放下炒勺扛起责任、将军放下执念寻找方向时，其实看到的是每个平凡人在时代浪潮中，都能成为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微光。这种平凡人的英雄主义，跨越了时空，让我们在回望历史时，更能理解当下的责任与担当。

意象诗性风格： 家国情怀的柔性表达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意象本身就承载着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团圆执念与家国情怀。剧中以“九个中秋”串联八年烽火，九轮圆月如同时间的刻度，将小家团圆的奢望与山河破碎的现实撞出强烈反差：防空洞里分食的半块月饼、逃难路上借月光辨认家书的眼神、离散夫妻对月遥寄的思念，这些场景让“团圆”从文化符号变成了支撑人们坚守的力量。

这种诗性表达，让家国情怀摆脱了空洞的口号，变得细腻而动人。张云魁与丁玉娇、孟万福与韩小月因战乱而离散的爱情，没有刻意渲染悲情，却在遗憾中让观众读懂和平的珍贵。“八千里路”是流亡与征战的艰辛，“云和月”是乱世中的温情与希望，两者交

织，传递出中国人在苦难中永不屈服的精神内核。

“月亮”是全剧的核心意象：“清冷的月光照在战场、战壕与寻常人家，月圆月缺间，有思念，有苦难，更有情感和精神上的淬炼。”“血染棉田”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洁白的棉花本是温暖的象征，却因侵略者的到来染上猩红，每一朵棉花背后都是一个破碎的家。导演张永新表示：“苦难会在故事中呈现，但绝对不消费苦难。”这种克制与节制，让悲伤不流于煽情，牺牲不化作廉价的眼泪。

个体的觉醒： 植根于血肉中的民族气节

当我们跟随剧中人物走完这八千里路，会发现这部剧讲述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民族在危亡时刻的集体觉醒。从少将到厨子，从文人到商人，每一个人都都在战争的淬炼中，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精神蜕变。

张云魁在经历了蒙冤、背叛与牺牲后，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信仰，不再是为某一个政权，而是为了脚下的土地和身后的人民而战；孟万福在守护张家人的过程中，逐渐懂得了“国家”二字的分量。他们的觉醒，恰如那个时代无数中国人的缩影，在战争的阴影中一点点汇聚成照亮黑暗的光。

剧名《八千里路云和月》，既是对剧中人物辗转千里抗战之路的概括，又是对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致敬。这八千里路，是山河破碎的苦难，是浴血奋战的悲壮，更是无数普通人用生命铺就的希望之路。当战争的硝烟散去，那些在乱世中坚守的善良、在苦难中生长的勇气、在绝望中觉醒的信仰，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八千里路云和月》以独特的叙事结构、极致的细节还原、诗性的意象表达与深刻的精神内核，成为抗战题材创作的一次突破。它没有神化英雄，也没有美化苦难，这样一部兼具历史质感与人文关怀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也是对民族精神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抗战的胜利，从来都藏在每个普通人的坚守里，而这种坚守，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冬去春来》：文化消费时代的视觉审美与现实“悬浮”

○ 李茂华

近日，电视剧《冬去春来》热播，引起广泛关注。这部以20世纪90年代为背景，以一群“北漂青年”为表现对象的年代剧，通过温暖的剧情设计、精美的服化道，以及“奋斗”“励志”的主题标签，赢得广大受众的喜爱。但随着故事的展开，这部剧也出现口碑的两极分化。究其实质，是文化消费时代电视剧创作过度追求视觉审美、忽视现实逻辑的结果。在文化消费的逻辑中，年代记忆被包装成可供消费的审美符号，而真实的生活经历则被驱逐。

被“美颜”的年代： 视觉审美与社会真实的背离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深化的关键年代。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党的十四大正式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为改革目标，国有企业改革，对外开放全面升级。经历过长期物资短缺的中国百姓在此时期也经历着思想的革新与渴望富裕的心理调适，整个社会弥漫着跃跃欲试的氛围。

《冬去春来》以这个时代为背景，讲述了一群文艺青年在北京追逐梦想的故事。他们有的背井离乡，为了在北京找到梦想实现的机会，一方面坚持学习，另一方面通过卖服装、洗油烟机、通下水道等方式维持生计；有的本身就是北京人，因梦想得不到家人支持，选择离家追寻自己的梦想。这群年

轻人在剧中相互温暖、相互支持，共同走向未来。全剧温暖而感人，演员及服化道设计精美、品质优良。但从剧情来看，这部剧因为弱化了时代背景中的真实社会矛盾，人物成长便失去了扎实的现实逻辑支撑，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在剧中，改革开放的艰难推进过程被隐藏，呈现在观众眼前的是几个北漂年轻人的相互暗恋和相互帮助。“真实”被驱离，“才艺”与“梦想”由此沦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悬浮于剧情之上。剧中，无论是庄庄(章若楠饰)还是沈冉冉(林允饰)，都容颜娇美、服饰精美、妆容精致，在一个物质条件还不算富裕的年代，她们却拥有多套不重样的服装。而女主角庄庄还兼具温暖、勇敢、坚韧、聪慧等种种美德，这样的“玛丽苏”式角色，压制了生活的真实，而将视觉美感提升到重要地位。审美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无情地磨平了历史的细节质感。

“悬浮”的北漂： 消费叙事下的“贫穷景观”

改革开放后，北京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和建设者，造就了新一代“北漂族”。“北漂族”大多是年轻人，且多数有着高学历、高素养和高知识技能。他们带着出人入地的梦想和信念来到北京，相信市场经济会为每一个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但现实并不如意，“北漂”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而生活环境差、工作压力大、“无

根”的茫然感是大多数北漂人共同的心理感受。

《冬去春来》这部作品聚焦于六位“北漂”青年的生活，他们共同租住在名为“冬去春来”的小旅馆里。这家旅馆位于半地下室，内部设有二十八个房间，每个房间容纳二到四人不等，所有租客需共享公共厨房、浴室和洗漱区域。若该剧意图展现北漂的真实困境，则目前的呈现方式存在明显不足：角色所处的环境显得过于整洁明亮，房间宽敞通透，甚至部分场景还流露出些许空旷感。一边是角色设定中捉襟见肘的经济状况，另一边却是画面里一尘不染的布景、充足的自然光效以及精心搭配的服装道具，两者之间形成了某种视觉与叙事上的割裂。在这种经过美学修饰的“贫穷景观”衬托下，“北漂”一族真实、艰辛而又充满生命力的奋斗轨迹，反而失去了扎实的依托，显得有些轻飘而“悬浮”，未能真正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

审美政治学： 当“看”成为主导的认知方式

《冬去春来》的困境，本质上是视觉文化霸权下的审美困境。在当代文



化消费中，“看”已经成为主导的认知方式，而“被看”的对象则必须经过审美的编码与规训。这使得年代剧不再是历史考古，而是视觉策展——它挑选那些符合当下审美趣味的元素（复古色调、文艺穿搭、怀旧物件），剔除那些“不雅观”的历史褶皱（贫困的粗砺、生存的狼狈、时代的荒诞），最终呈现出一个可供消费的“洁净版”年代切片。

对比1993年同样由郑晓龙导演的

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冬去春来》被视觉文化所规训的电视剧审美特质，便显得尤为突出。《北京人在纽约》讲述了一群怀揣“美国梦”的中国人在纽约这片异乡的挣扎与奋斗历程。剧中的核心人物王启明，本是中国一位备受尊敬的大提琴家，他满怀对彼岸富裕生活的向往远渡重洋，然而现实却残酷地告诉他，他曾经取得的成就在美国社会几乎一文不值。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放下艺术家的尊严，在餐馆从事洗碗工作。当他凭借坚韧与机遇，从洗碗工逆袭成为制衣厂老板时，美国经济周期性的衰退风暴又无情袭来，令他一夜之间失去所有。这部电视剧以其冷峻甚至近乎残酷的笔触，深刻解构了当时在中国社会风靡一时的“美国梦”神话。但《冬去春来》的故事，却将重点聚焦于剧中人细腻的感情描写。人物所遭遇的挫折与困境，往往并非由复杂的社会系统或深刻的历史矛盾所生成，而更像是一系列偶然事件与意外叠加的结果。人物最终走出困境，所依靠的也常常是暗恋之人的及时援手或命运馈赠。“美好”的爱情叙事与“唯美”的视觉感知相互交织，共同编织出符合文化消费时代需求的“洁净版”年代剧图景。

在观众审美力日益提升的当下，我们更期待既有现实的表层褶皱，又有历史的深层叩问；既有视觉的审美感知，又有温暖的历史情怀的电视剧文艺精品。希望未来的年代剧能真正扎根现实，迎来创作的春天。